

張之洞 著
龐 堅 校點

張之洞詩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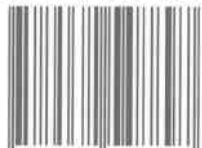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架建議：中國古典詩文集

ISBN 978-7-5325-4889-7



9 787532 548897 >

定價：55.00元

易文網：www.ewen.cc

張之洞 著
龐 堅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張之洞詩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之洞詩文集 / 張之洞著; 龐堅校點.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8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4889-7

I. 張… II. ①張…②龐… III. ①詩歌—作品集—中國—近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國—近代 IV. I215.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04218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張之洞詩文集

張之洞 著

龐 堅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2.5 插頁 7 字數 459,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4889-7

I·1995 定價: 5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序 言

錢 仲 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僂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

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彞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一

張之洞，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聽上去既感到熟悉，却又未必對其生平有多少深入瞭解的古人。一般人或許知道張之洞是晚清著名的大臣，却不大會知道張之洞也是一個出色的詩人。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張之洞早已受到很多當代學者的重視；但作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獨具面貌的詩人，一個重要詩派的領袖人物，他却一直被忽視。如今，是到了改變這一局面的時候了。

中國先秦的哲人孟子早就提出知人論世的觀點，我們要對張之洞的文學地位有所評定，就必須對張氏的生平及其思想有所了解，茲先將張氏的生平作一介紹。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又號靈公、抱冰、無競居士，室名廣雅堂、抱冰堂，因係直隸（今河北）南皮人，人或稱之為張南皮。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八月初三日，他出生於貴州興義府其父張鏜的知府

官舍。五歲入塾受學，讀書「詳詢字義，必索解乃止」（胡鈞《張文襄公年譜》）。九歲「讀《四書》、《五經》畢」，「非獲解不輟，篝燈思索，每至夜分，倦則伏案而睡，既醒復思，必得解乃已」（同上）。故成年爲官後，他「治文書往往達旦，自言乃幼時讀書好夜坐思之故」（同上）。十歲學作詩與古文，泛覽清代各家說經之書及史部、子部典籍，一生學問文章，肇基於此數年。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他高中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時僅十六歲。其父好友胡林翼聞訊，爲之「開口而笑者累日」（同上）。次年例應參加會試，但張之洞却未與試，可能是父親認爲其年尚少而沒讓他參加。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他仍未赴春闈，只參加禮部的另一個較低級別的考試，被錄取爲覺羅官學教習。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他將赴會試，却因族兄張之萬是同考官，依例回避。次年恩科會試，張之萬仍爲同考官，他又不得與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再逢春闈，考前他總算沒有遇到阻礙，閱卷時同考官范鳴銖極爲賞識其才華，竭力向主考官推薦，另一位同考官翁同龢也稱贊其時文卷子有「《史》、《漢》之遺」（《翁同龢日記》），但主考官不予理會。最終，張之洞未能中式，僅在試後被選用爲膳錄——一個極爲卑微的職位。這當然不會讓張之洞滿意，於是他暫時回到河南，先後進入在河南本籍督辦團練的副都御史毛昶熙和時任河南巡撫的族兄張之萬幕中理文書。

過了兩年，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舉行恩科考試，同考官中仍有范鳴銖，張之洞終於得中第一百四十一名貢士，范喜而賦詩，有「再到居然爲此人」之句。殿試時，他的策論直陳時政，「不襲故常行墨程式」

（胡鈞《張文襄公年譜》），爲閱卷大臣所不悅，準備抑入二甲末，唯竇鑿賞其文，奇其才，遂將其拔置二甲第一。試卷進呈兩宮皇太后，復蒙垂青，竟再進二甲第三，也就是探花。不久朝考，列一等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與其他人相比，從入翰林的年齡上看，張之洞在科舉之途上雖非一蹴而就，但顯然走的仍是一條「快車道」，爲當時所稀見，故李慈銘曾頗有感慨地說：「近日科名之盛，盛推南皮張香濤。」（李慈銘《越縕堂日記》）

不料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翰林大考，張之洞因一時疏忽，考卷脫一字，被抑爲二等第三十二名，這對他應該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好在此事只是影響一時，他馬上就從陰影中走了出來。次年六月，他被派往浙江任鄉試副考官，這應當是他留心甄拔、培養人才的開始，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此科浙江鄉試，所取舉人如袁昶、許景澄、陶模、孫治讓、譚獻等，後來在學術、政治、辭章等方面各有成就，爲前後數科所不及。同年八月，他又接到朝旨，授官湖北學政。學政之職，專管一省學校生徒考課黜陟之事，亦兼管省內一切有關教化文物及學術之事，不計本人官階高低，皆享有欽差官待遇，地位與總督、巡撫平等，是一個重要的職位。他到任後，「以根柢之學砥礪諸生，有講求經學、博聞強識者，特加甄撥」，「以端學行、務實學兩義反覆訓勉」（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對學校的一些制度進行了改革，並與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商議，別建經心書院課士。這些措施，曾受到曾國藩的贊許。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十月，張之洞任滿交卸，回京復命。次年五月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逾年，加

侍讀銜。這一段時間清閑無事，常與文友作詩酒之會，詩文甚多。他所代擬的《平定粵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兩篇駢文，鋪張揚厲，藻采紛呈，褒美得宜，極受慈禧太后賞識，這為他之後的仕途亨通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張之洞又被派任鄉試副考官，這次他去的是四川，至成都，已勞頓成疾，但試期已迫，不得不馬上投入工作。鄉試方畢，奉旨就任四川學政。在任期中，他打擊科場舞弊，懲治不法之徒，倡導研經治史、實事求是之學，獎掖積學能文、才華卓犖之士，並創建尊經書院，親撰《輶軒語》及《書目答問》二書指示諸生治學門徑。這兩部書，充分反映了張氏的教育思想與學術思想，是近代教育史、學術史上的重要文獻。

在四川學政任滿後，張之洞又回到京城任職。自光緒三年（一八七七）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先後任教習庶吉士、國子監司業、左春坊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讀、右春坊右庶子兼日講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這一段時間裏，京師是張氏作為「清流黨」成員叱咤風雲的歷史舞臺。所謂「清流黨」，指的是以清望自重，敢於上疏言事論政，指陳弊病，彈劾大臣的一批京官。分北清流與南清流（或前清流與後清流），北清流以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高陽人李鴻藻為領袖，主要成員有張佩綸、寶廷、陳寶琛、張之洞、黃體芳、鄧承修、王懿榮等人；南清流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吳江人沈桂芳、軍機大臣常熟人翁同龢為領袖，主要成員有盛昱、王仁堪及稍後的文廷

式、志銳、黃紹箕、張謇、丁立鈞等。北清流較早產生影響，南清流多爲所謂「帝黨」人物，在光緒中後期最爲活躍。南北清流雖同稱清流，但經常意見不一，甚至互相攻擊，張之洞與翁同龢之間就有很大的矛盾。當時，京城中人以「青牛」諧言清流，稱李鴻藻爲青牛頭，張佩綸、張之洞爲青牛角，陳寶琛爲青牛尾，寶廷爲青牛鞭，王懿榮爲青牛肚，糾彈官僚的「頂人」之事主要就由牛角承擔。實際上，所謂清流黨並沒有明確的組織，只是以一種道義上的標準來作爲自己的行動指南。張之洞主持公義，直言敢諫最令人稱道的有這麼幾件事：一是光緒五年（一八七九）三上奏摺爲平反東鄉冤獄剴切陳情，二是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至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二十多次上疏爲指陳中俄條約之弊慷慨進言，三是光緒六年（一八八〇）爲恪盡職守不讓太監仗勢強闖午門的護軍玉林等人呼籲請命。這幾件事最足見其風采，爲他贏得了「諍言回天」的美譽，令他攢下了一筆相當豐厚的「政治資本」。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張之洞得授山西巡撫，從此進入其仕途的新階段，而他本人也經歷了從上疏論事的清流要員變爲主持洋務運動的一方重臣的角色轉換過程。在山西巡撫任上，他整頓吏治，懲治貪官，清理庫款，釐正稅金，勸農備荒，厲禁煙毒，又設立洋務局，籌劃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興辦廠礦實業，開築公路，編練新軍，頗做了一些實事。中法戰起，他對形勢作出了自己的分析，數次上奏，爲中樞所重，於是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三月受召進京商詢機務，四月便受命署理兩廣總督。到廣州赴任後，他與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彭玉麟和衷共濟，給予劉永福黑旗軍合法地位，起用老將馮子材，紆籌決策，苦心

孤詣，終於在諒山一役中大敗法軍，為鴉片戰爭後屢受西方帝國主義欺凌的中華民族出了一口惡氣。這一戰，前方將士之苦戰，固然是致勝的重要原因，而張之洞之運籌帷幄，則「實為功首也」（唐景崧《請纓日記》）；張氏去世後，得諡文襄，實緣於此。中法戰事既定，張之洞開始在兩廣將他起步於山西的洋務運動全面推行起來。這時，他辦事已帶有明顯的務實精神，非復當年放言高論的清流黨習氣。張氏在廣東所興辦的洋務，主要有這麼幾項：興水師，造軍艦；募兵編練新式軍隊廣勝軍；籌建槍彈廠、槍炮廠；創建水陸師學堂，延聘西人任教習，培養新式人才；訂購外國織機，籌建紡織廠；訂購高爐，籌建鋼鐵廠；建設廣州機器鑄幣廠。其中有幾項因他調任湖廣總督而移至湖北完成。

張少洞移任湖廣總督是在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此後直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受召赴京進入帝國中樞，除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兩度暫攝兩江總督外，他一直駐節武昌，以湖北為其最主要的政治舞臺，上演了一齣齣對近代中國有着重大影響的活劇。官營漢陽煉鐵廠、湖北槍炮廠、湖北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製麻局等大型企業，白沙洲造紙廠、武昌製革廠、湖北呢呢廠等中小型工廠的創辦；蘆漢鐵路、粵漢鐵路的興建；民營工商業如燮昌火柴廠、既濟水電公司等之運營，都是張之洞在湖北從事洋務運動的實績。儘管花費的鉅資與取得的實際效益常不相伴，以致貽人「好大喜功」、「糜費不已」之譏，但這些開創性的事業，無疑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的壯舉，絕不能輕易抹殺。論洋務運動，論對民族工業的貢獻，曾國藩、李鴻章有開創之勞，而張之洞則是繼起的

領袖人物，是取得卓越成績的歷史功臣。

重視教育，大辦學堂，也是張之洞一以貫之的政策。他所創辦的書院類的學校有經心書院、兩湖書院，皆授新學課程。新式學堂則先後設立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文普通中學堂、文高等學堂等普通學校幾十所，湖北師範學堂、兩湖總師範學堂等師範學校若干，湖北算學學堂、自強學堂、方言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礦業學堂、軍醫學堂等多種專門學校，造就了大批人才。他還派出一批批青年學生出洋留學，並以出洋留學為快速培養新式教育師資的重要手段，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有效的舉措。

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還積極編練新軍。此前在陝西巡撫、兩廣總督任上他已做了一些工作，因任期較短，未能全面開展；而在湖北，他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去做這些事。所募新兵，皆聘德國（或日本）軍官任教習督導，裝備、後勤、訓練，均取法西方軍事強國。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政府定新軍軍制，湖北新軍被統編為陸軍第六鎮（鎮相當於師）和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相當於旅），共有官兵一萬六千人，實力在新軍中僅次於北洋六鎮。湖北新軍的軍官很多是廢科舉後另謀出路的底層知識份子，其中不少人加入了革命組織，宣統三年（一九一）武昌起義爆發，其領導人就是湖北新軍中的革命者。因此，也可以說張之洞客觀上為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起到了一定作用，這當然是他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戊戌變法、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的庚子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

兩個極爲重大的事件，作爲坐鎮一方的封疆大吏，張之洞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康、梁倡言變法之初，都曾倚重張的聲望與實力，而張也對康、梁等人頗加禮遇，雙方在政治改革上有某些共同點，主要是期望振興國家，改變積貧積弱、見欺外夷的局面。北京強學會成立，張之洞捐銀五千兩，上海強學會建立，他又捐銀一千五百兩，支持的態度非常鮮明。但後來因爲思想上的分歧，雙方漸行漸遠。不過，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扼殺變法之前，張並未公開反對變法。從學術淵源上看，張之洞素惡公羊學，斥之不遺餘力，而康有爲所撰《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及其他一些文章中爲變法張目的基本理論，正是托於公羊學，雙方自然對不攏。而從人際關係上看，張之洞頗受慈禧太后眷顧，常被認爲是后黨人物，與最初嚮光緒帝引薦康、梁的帝黨核心人物翁同龢不睦，這多少也影響了他對光緒帝企圖擺脫慈禧太后，建立新政，實施變法的支持度。並且，張之洞是所謂「溫和改革者」，所以不能接受康、梁等人激進式的改革方案。他堅決維護綱常名教，對《時務報》在梁啟超主持下積極發表文章抨擊專制、提倡民權的做法深爲不滿，因而在變法的緊要關頭寫了著名的《勸學篇》來闡述其「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括之以五知：一知耻。……二知懼。……三知變。……四知要。……五知本。」（《勸學篇·序》）書成後由黃紹箕呈進，六月七日奉上諭：「原書內、外各篇……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爲刊佈，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有人認爲張選在此時拋出《勸學篇》，目的是

「預爲自保計」，怕變法「事不成有累於己，乃故創學說，以別於康、梁」（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預爲自保」恐怕言過其實，因爲張之洞從未像湖南巡撫陳寶箴那樣大行新政，與慈禧太后的關係也並未疏遠，似乎沒什麼好擔憂的；「以別於康、梁」則確乎不移，因爲他覺得到了節骨眼上，需要自己系統地發表一下意見了。戊戌變法失敗後，曾與維新派關係頗近的張之洞以先著《勸學篇》得免議，這充分表明慈禧太后並不將張之洞視爲康、梁的同路人，張氏於是繼續得到信任與重用。

庚子事變中，張之洞在義和團初起時就堅決主張剿滅。八國聯軍人侵後，兩宮西狩，他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策劃「東南互保」，通過盛宣懷牽綫搭橋，與各國駐滬領事商談條款，擬訂立《中外互保章程》。雖然這個章程最終並未簽成，但「東南互保」已成事實。「東南互保」的目的，當然不是地方獨立，而是維護清朝政府在東南各省的統治秩序，它遏制了義和團勢力在南方的滲透，又利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使之互相牽制，有效阻止了外國軍事力量深入長江流域縱深地區。在這期間，他還扼殺了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東南互保」的實施，雖然是違抗朝廷與列強開戰旨令的行爲，但客觀上維持了中國南方地區的社會安定，爲清廷保存了一份元氣，所以事情過去以後，主謀者之一張之洞並未受到朝廷的斥責，反而獲得了嘉獎，慈禧太后對他一貫的好感似乎更有加深，有意召他進入軍機處。但因某些微妙的因素牽制，這事拖了幾年才實行。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五月，張之洞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六月，授大學士，仍留湖廣總督

任。七月奉旨入京，補授軍機大臣。離湖北到京赴任後，他蒿目時艱，頗有鞠躬盡瘁、起衰救弊之心，積極襄贊立憲新政，促使朝廷化去滿漢畛域，雖頗遇掣肘，多少還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次年，光緒帝、慈禧太后短時間內相繼去世，腐敗無能而又剛愎自用的滿族親貴勢要載灃、載濤、載洵等攬權營私，益發猖獗，使他日益陷於無可奈何的困境。不斷加深的憂思，嚴重影響到他的健康，導致他舊疾數次發作。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八月，他因病入膏肓，藥石無效，溘然長逝，享年七十三歲。據說，朝廷聞耗議謚，本已擬定賜謚文忠或文正，後因見其遺摺中有「不樹黨援，不殖生產」（據說這兩句話實際上也不是張之洞自己寫的）等語，正觸到滿族親貴勢要的痛處，遂改謚文襄。按文襄之謚，本應賜予武功卓著之臣，而張之洞雖在中法戰爭中重用老將馮子材等取得諒山大捷，但畢生事業，仍以政事、經濟、文教為主。從這一賜謚中，也可以看出此時的清廷中樞斤於小節而不識大體，已是氣數將盡。

對於張之洞其人，有贊其公忠體國，廉正勤敏，推之爲完人者，見諸其門生故吏的一些哀挽與序跋文字等；也有訾其汲汲功名，剛愎自用，耗國靡費，讓其自矜風雅，飾智驚愚，役使僚屬，甚或發其隱私者，見諸清末民國間某些文人學者的筆記等。如作持平之論，我們可以說張之洞爲人處事雖然有不少可議之處，但他一生確實爲國家與民族做了一些實事，爲官也頗清廉，後人理應給予他較高的評價。

二

張之洞雖一生以政治家爲主要身份，但他實際上也是一個教育家、學術家、詩文家，並且是一個對近

現代中國有過重大影響的思想家。他一生的主要政績，是大力推行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有得有失」；他一生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則是確立了著名的「中體西用」理論，在後世也是毀譽參半。

「中體西用」，即「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它並非張之洞的首創，這已是學術界的共識。綜合今人的研究成果，推源溯流，我們可以發現，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就已聲稱當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爲本原，以西方的「富強之術」爲輔助。差不多同時，王韜的「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杞憂生易言跋》）之語，適與之桴鼓相應。此後，鄭觀應在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刊行的《盛世危言》中的《西學》一章中也明確提出：「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正式揭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則首見於沈壽康之《匠時策》：「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爲華人計，宜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不久，孫家鼐在開辦京師大學堂的奏摺中，又把「中學爲主，西學爲輔」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合在一起表述，認爲：「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西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到了張之洞手上，「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遂形成了一套較爲完整的學說，其論述遠較上列諸人全面而有系統，具有較強的理論色彩，具體內容也非常豐富。因此，人們一提起「中體西用」，便不免會首先想到張之洞。確實，張氏雖非這一觀點的創始者，却是把這一觀點發展成一種理論的重要思想家。現代最著名的學者之一陳寅恪先生自稱自己「議論近於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舉此一例，亦可大致了解張之洞「中體西用」理論的深遠影響。有鑒於此，對